

敘事社會學：關於失業和貧困工人

N. 姆納德

巴黎第七大學

摘要 有關社會問題的知識並不是被社會科學所壟斷的；所謂“後西方社會學”應該包括大量的敘事社會學。本文將通過對兩張快照以及失業和貧困問題的討論來說明這一點。

本文的目標是，第一，我要澄清有關社會問題的知識並不是被社會科學所壟斷的，順便回顧一些嵌入在不同的社會敘事中的寶貴知識（第一部分：文學與社會學）；第二，我將嘗試說明我們所宣導的後西方社會學將會包括大量的敘事社會學（第二部分：社會敘事）。在過渡部分，我將評論兩張快照，一個拍攝於1930年代，另一張是1980年代，還會嘗試闡述它們的共同之處（過渡部分：兩張快照）。失業和貧困問題將是貫穿我整個評論過程的經驗基礎。這也是我為什麼要以慈善和正義問題作為結束（結語：慈善和正義）。

一 文學與社會學

正如我的一個同事剛剛呈現的，針對貧困者的政策總是處於“匱乏”狀態，針對貧困者的社會服務同樣也總是處於“匱乏”狀態。或許我們可以由此推斷有關貧困者的科學和知識也是如此，這些知識是匱乏的。然而，事實並非如此。以19世紀



早期為例，很多有才華、有教養、富有責任感的作家、牧師、慈善家、記者、公共活動家、政治家和小說家，已經開始關注工人階級、農民和普通人的貧困問題以及這些人的生活狀況。從巴爾扎克到傑克·倫敦都在關注這些問題，這裏需要特別強調的是社會學傳統——他們試圖理解什麼是貧困，貧困如何產生以及如何消除貧困，比如奧古斯特·孔德和塗爾幹就試圖建立一個有關社會的科學來回答他們所關心的問題。社會科學的建立不僅像 Wolf Lepennies¹ 所指出的與文學差異，而且與社會“常識”也有所不同。在19世紀末，社會學和政治改良主義彙聚在一起，其中塗爾幹的社會團結觀念契合了工人階級爭取福利的改良運動，並在相關會議上促成了福利國家的出現。但是在20世紀，當社會學作為學術知識在大學取得一席之地以後，它們再一次分道揚鑣。

讓我舉幾個20世紀早期的例子來說明嵌入在這些工作中的寶貴知識，在這裏我們不必在意這些知識的非學術性和不純粹性。事實上，這些知識本來就不是出於學術目的而生產的，自然也不能依據學術規則評判。

讓我們從著名的《馬林塔爾失業調查》² 開始。當作者在1930年代開始研究馬林塔爾的失業問題的時候，這個奧地利小鎮遭受了金融危機的嚴重影響，失業率水準較高。這些研究者的目標是幫助解決失業問題，與此同時，理解失業者的經歷，研究失業對個體和集體社會生活的影響。社會民主黨的成員在調查之前就已經通過社會民主黨的網路聚集在維也納，他們設立慈善組織，提供免費的衣服和鞋子，以這種方式進入了馬林塔爾。正如皮埃爾·布迪厄在本書的法譯本序言中強調：這部著作的科學成果直到今天仍有巨大的價值。第一，他們運用時間管理方法，分析了時間的意義如何被失業放大，失業工人相比於被雇傭狀態的工人擁有較少的社會生活，因此前者的社會生活受到限制。在這個例子中，人們更願意說“金錢就是時間”，而不是說“時間就



是金錢”。第二，他們說明了經濟剝奪如何改變生活，但是需要強調的例子是處於失業剝奪的群體仍然會分出一部分錢到他們的葬禮上（另一個是著名的美國社會學家衛維恩娜·澤利澤在她的著作《金錢的社會意義》³）。第三，他們通過個人傳記，分析了失業者如何應對或者逃避這種境況。研究結果表明面對失業，男女之間有差異，因為即使失業了，女性仍然可以投身於家務活，因此她們的生活也較少失序；此外，失業前的收入水準和失業者過去的經歷都會對此造成顯著差異。正如他們所呈現的，在那些變的越來越好的人中，有一半的人開始急劇的變糟糕，另一半則需要比其他人（那些擁有其他人沒有的資源的人）忍受更長時間的剝奪，而那些早就已經長時間處於貧困的人，是忍受剝奪時間最長，也是生活情況變的越來越糟糕、越來越嚴重的那些人。

讓我們跟隨James Agee記者和傳記作家Walker Evans，來看看同樣在1930年代地處大西洋另一邊的美國。James Agee和Walker Evans⁴再現了庫頓的種植園主在他們農場上的生活，這不僅是對他們私人和家庭生活極具洞察力的描述，以及從政治和哲學層面分析富人和窮人、研究者和被訪者之間的關係，而是一個有關種族的深度分析，他們分析了身處相同剝奪情境中的黑人和白人種植園主。（比如羅伯特·埃利亞斯和John Scotson, *The established and the outsiders*⁵）

我不會忘記一個最近的例子，Robert Roberts' Classic slum⁶，一個索爾福德貧民窟的研究，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的調查正是在這個地方完成的。20世紀初期，出生在這個貧民窟的雜貨店老闆Robert Roberts的兒子，通過講述他的個人傳記，通過將他的收入、食品、衣物、健康和閒暇……等經歷變成統計資料，展現了在貧民窟的生存環境中，社會生活、風俗和實踐規則是不受經濟危機/金錢匱乏的影響而持續起作用；同時也說明了在一個普遍貧困的狀況下，收入之間的微小差異是如何



被用來重塑和維持日常生活的社會秩序。這個雜貨店裏有一個規則，就是每次購買至少一盎司的火腿、黃油或者乳酪。因此最貧困的人，也就是不能購買一盎司物品的人，不敢親自去雜貨店購買商品。他們會讓他們的子女到雜貨店買半盎司的物品。當這個男孩兒或這個女孩兒買東西的時候，雜貨店裏的顧客會通過流言來強化這個規則，這些話就像孩子們耳朵裏聽到的歌曲，他們在回到家裏以後會復述給他們的父母聽。（類似的例子我們在馬克斯·韋伯的合法性和齊美爾《貨幣哲學》中可以看到）。

這一時期的法國我也可以給出很多例子，比如 Louis Calafertes 的 *Requiem des innocents*⁷。但是它們並不是很多。為什麼重新挖掘這些珍寶是有價值的？首先，為了擴大社會學的傳統，為了賦予社會學更多的意義和更大範圍，也為了重新定位他的社會和政治背景。第二，如果我們同意那種說法，那麼將社會學發展為一種“公共社會學”（麥克·布洛維作為2004年美國社會學協會主席的發言⁸），提出有關知識類型和形式的問題就是有價值的。相比於學術風格，我上面所提及的作者們更像是一些講故事的人，他們寫作的風格和形式是這樣的：我決定研究他們，我到了那兒，我和這個人聊聊和那個人聊聊，我開始意識到了這個和那個，我已經看了這個，聽了那個，我感覺是這樣的和那樣的，我理解這個和那個等等。他們的報告是一種敘事形式，在那裏我們能夠發現其他敘述者，以及不同敘述者和不同敘事之間的關係。這些故事並不僅僅是自傳，這一點非常重要，正如 Hans Gadamer 強調過的自傳也是“一種歷史的再現”⁹——不僅僅是個人傳記，而是集體傳記，這是遭受損失和失業時，發生在一個城市，一個社會群體中的故事。或者，如果你願意的話，個人經歷是再嵌入在社會變遷的大背景之中的，也就是說，個體經歷與其他人相互連結並且影響著其他人的經歷。正是這種嵌入性，形塑了人們講述他們自己的故事和經歷的方式；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他們會先



去強調什麼樣的觀點，看輕哪些想法；重視哪些想法、道德觀和政治觀，哪些又會被忘記，以及工作、愛、家庭和政治這些話題如何被他們敘述。比如，在每個國家福利如何不同地形塑生活。

毫無疑問這些特徵在不同國家、不同時代是各不相同的。請允許我給你們簡單地介紹一個法國小鎮，1980年代我在這個小鎮開始進行失業和經濟剝奪研究。在這一時期，工廠都關閉了（或許在中國還是開著的）。我們研究一批失業者的生活，他們是相對較低技能、靠單純出賣勞動力的工人，在經濟危機的時候是往往是第一批被解雇的人，也就是說他們是較底層的工人階級，失業之前就已經長期處於貧困狀態。當地政府將他們集中安置在城外保障住房街區以便能進行中心城區的重建工作。在這些街區，經濟剝奪肆意蔓延，只有1/3的成年人有工作；從整體上來看，這個群體的收入大約1/3是來自工作收入，2/3來自社會福利，還有大概10%是來自非正規就業或非法手段。因此日常生活中從1到10的等級差異顯得極為重要。他們仍然屬於工人階級，共用著工人階級的精神氣質和實踐方式，我們稱之為“強制性團結”。事實上，為了留在這個地方，並且被其他人所接受，人們就必須要進入這裏的人際關係、經濟和符號交換網路。只有這樣每個人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才能生活下去，否則的話，就會被迫放棄這個群體，甚至被迫離開。這是一種社會向心力，它迫使每個人將集體至於優先地位；社會向心力強於社會離心力，社會離心力是一種促每個人朝向集體之外的世界和體系的力量。總體來說，這個地方是一個庇護的場所，也是一個監獄。

研究過去30年後，我收到了一份郵件，他們詢問我們發生什麼事情了，為什麼沒有再回去，並且告訴我們一些新的消息。它表明社會學和這個網路有連接，也會被這個網路改變。10也許被訪者是無名的，但是社會家或者他們的作品在這個網路中卻很容易找到。不管它是什麼樣子，我們在2010年的時候重新回到了那



個被社會學家和民俗學家稱之為“田野”的小鎮。現在，單純的體力勞動者、無技能的勞動者和苦力勞動者已經沒有了。這個地方卻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研究我們已經知道他們30年前的生活的人的生活敘事的機會。我們見過的大多數成年人現在已經退休了，很多人去世了，也有很多已經離開了這座城市。當他們講述他們的故事時，呈現出很大的差異。男人（男性）以他們一生中的工作經歷為主線講述他們的故事，即使事實上，他們在大多數時間是沒有工作的。比如說，有一個男人，講述他以前的工作生活，歷數了他的工作，並且指責他以前的鄰居懶惰、不工作。但是當我們問他的養老金總量時，我們發現他只有很少的養老金，甚至沒有達到一個一直都在工作的人的養老金的最低水準。這是不是意味著他在欺騙我們，他並沒有如他所說的那樣一直都有工作？或者這意味著他的雇主剝削了他的勞動，不承認他的工作，也不付給他薪水？或許這兩種假設都是真實的。但是最重要的收穫是工作的重要性，是這個群體的道義經濟中工作具有的责任力量。與此截然不同，女人，即使是那些終生都在工作的女人，卻把她們敘事的重點放在了她們的家庭、子女、丈夫、父母；子女教育的故事和子女現在的發展；她們經歷過的分離、離婚、疾病、喪親之痛等。

這個研究的另外一個成果是有關社會記憶的。正如你們知道的莫里斯·哈布瓦赫創立了社會記憶的研究，在他的第一部作品《論社會記憶的結構》¹¹中指出“過去影響著現在”；但是相反的或者說同時，他在第二部作品《論集體記憶》¹²中指出“現在影響著過去”。當我們和工業時代的見證者交談的時候，可以清楚的看到這兩個過程對記憶的作用。他們所有人都回憶了有關去工業化的重要的集體經歷，有關世界失去了什麼，工人階級文化，城市空間，工作倫理，休閒方式等。可以看到過去影響著現在，影響他們理解社會變遷的方式。但是他們回憶過去的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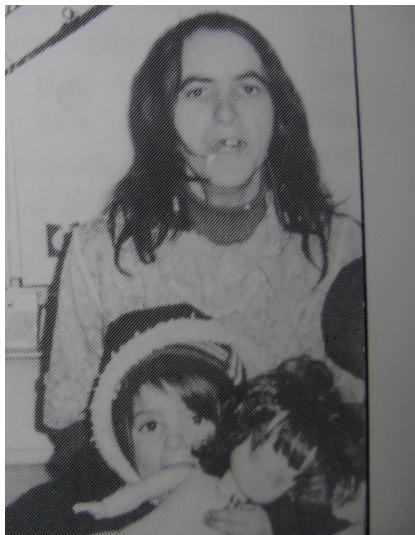
式卻不盡相同。那些一直處於失業和貧困狀態的人，對過去表現出強烈的懷舊情緒，悲歎一個（廣泛地）想像的共同體的消失；然而那些相比以前生活的更舒適的人——足夠幸運（或擁有足夠的資源）重新找到一份工作，或者他們的孩子可以從學校中獲利，並不願意花太多的時間回憶過去，而是明確的表明他們的生活和以前不一樣，並且有所改善，他們創造了一個新的開始。因此，現在也影響著過去。每個人根據當前所處的情境來建構他們的過去。

二 過渡：兩張快照

我希望在那部分已經表明這些不同的調查和不同形式的知識的共同特點。如果我們通過不同的時間和社會歷史背景達到了相似的想法，那麼人們的照片有一些共同之處也就不足為怪了。以下麵兩張快照為例，一張取自James Agee和Walker Evans¹³的書中，拍攝於1930年代，另一張取自我自己的研究中，拍攝於1980年代。

這兩張快照的共同之處是什麼呢？為什麼它們有共同之處？從一種實用主義的視角出發，“是什麼”和“為什麼”的答案隱藏在“如何是這樣”之中。這兩張快照是誰，怎麼樣，出於什麼目的製造或採集的？記者和社會學家為了研究貧困問題製造和採集了這兩張快照¹⁴，而且他們的快照也說明了失業和貧困如何在人們的身體上打下烙印。不考慮不同的社會歷史背景，以及一個是社會記者另一個是社會學家的事實，這兩張快照之所以有共同之處是因為人們的身體都受到了惡劣的生活水準和低社會經濟地位的影響。





三 敘事社會學

如果我們有時間和空間仔細地審視作品本身，它也能夠表明來自不同背景和踐行不同寫作風格的作者，比如社會學、文學、記者等，也會提出那種類似的問題並且給出類似的答案。正如Richard Brown¹⁵所言，可供所有作者運用的隱喻並且願意用作討論社會和社會行為的隱喻只有5種，分別是：1、社會是一個有機體，一個整體；2、社會是一個機器；3、人類行為是一種語言；4、人類行為是一個戲劇；5、人類行為是一種表演，一個遊戲。因此，不同類型的寫作其實都依賴於一個共同的社會詩篇，社會事實、話語、行動和思想詩篇。與其把這一詩篇割裂成很多碎片，第一片旨在科學，第二片旨在娛樂，第三片旨在理解，第四片旨在政治，如此等等，知識的建構更應該把這些不同的部分變成一種關於社會的一般知識，畢竟社會詩篇能夠成為一種敘事，因為敘事早已經成為它的共同語言¹⁶。



後西方社會學不能僅僅奠基於從老舊的男權主義、沙文主義和西方的民族優越感中脫離出來這一消極的目標之上。為了應對新問題，比如文化的巨大發展和新的溝通方式，它需要以社會學傳統和對社會學傳統的革新為基礎，發展一個積極的目標。這種革新最近發生在社會科學的歷史學中，像1960年代的“語言學轉向”，或者，在一個更小的方向，即1980年代的“傳記轉向”。當人類學家Clifford Geertz¹⁷說社會科學變革和重構的主要特徵是一種“模糊的風格”，就預測了它是一種“敘事轉向”。

說到這一點，在1980年代的同時期，人類學家也投身於發展一種“敘事人類學”。這一嘗試主要受到了《人類學和人文主義季刊》的支持。既然人類都是故事的製造者和故事的講述者，這一觀點激發了Gregory Reck¹⁸，那麼社會科學的目標將是搜尋和報導人類賦予這些故事他們的意義的情節。它也認為如果是以嚴肅的田野研究為基礎創造人物，是能夠像出於科學目的而創造的模型或者類型一樣真實的。從另外一個角度看，Nancy Schmidt¹⁹盤點了大量的人類學家寫的小說，她很好奇為什麼他們中有那麼多的人參與到一種虛擬姓名之中，並且小心地將他們的科學活動和文學活動分離開來。她也很好奇為什麼科學刊物幾乎都沒有注意到這些書，即便它們中的一些變得非常流行而且已經被在這些文本中戲劇化的社會群體中的成員的據為己有。根據她的說法，人們甚至能夠表現出那種虛擬，這種隱藏的文學形式已經影響了人類學理論和方法的發展。

然而，30年過去了，敘事人類學的發展很有限。人類學家Eugenia Tsao²⁰仍然在宣導文化人類學的認識論優勢，他也支援敘事能夠提供給它理論框架，人們不需要刻意地發展的觀點。理論不用處在文本的中心就能夠指導它。她给出了一些具體的民族志學者的有關敘事的作品，而且在不丟失它們的科學價值的壓力下能夠被理解。她引用了Laura Bohannan²¹的例子：《這裏，我只是



像一個人一樣的寫作》。它清楚地表明通常一個社會學家是不會像一個人一樣的寫作。那麼不像一個人的社會學家史如何寫作的呢？或許作為一個秘密社團的一個成員，有義務去順從，如果不是教條的話，就像Lila Abu-Lughod²²所說的，去“因循守舊”。

它可以總結為，在通向敘事社會學的路上，阻礙我們前行的最主要的問題不是科學性的而是制度性的，是社會學家自己製造的一個障礙。但是這一總結在不同的知識領域會有嚴重的影響。

四 慈善和正義

既然這篇文章是關於失業和貧困的，那麼我將用著名的慈善家Jane Adams的話作為總結，她在20世紀初期在芝加哥工作和寫作，並且與“芝加哥學派”的社會學家一直保持合作關係。她曾經說，有兩種群體對失業和貧困問題感興趣：一種是慈善派，他們“出於‘對窮人的同情’而採取行動”；然而激進派總是“被‘對不公的憤恨’所點燃”。²³這兩個群體至少聯合成一種對更加公正的社會境況的有效要求，它們強有力地推動了現代福利國家的形成。

這種聯合是怎麼發生的呢？正如Jane Addams所言，“當慈善派通過證明貧困和犯罪往往是不利的工業水準造成的後果達成這一聯合的時候，激進派也慢慢地接受這個事實，如果他們想有效地吸引公共輿論，就必須盡可能詳細地收集有關窮人和罪犯狀況的資料……就像慈善派已經從對個體的照看過渡到對社會原因的思考，激進派也被迫通過對實際生活中的人的一種同情式的觀察去檢驗他的社會學說”。

在21世紀初期，建設和重新建設福利國家仍然像過去一樣迫在眉睫，創造一種滿足公共需求的社會情境，並且在我們所寫所



說之中表達我們對實際生活中的人的同情式的觀察，這難道不是我們要擔負的責任嗎？

注釋

- 1 Lepenies, Wolf, *Les trois cultures: entre science et littérature, l'avènement de la sociologie*, trad. de l'allemand par Henri Plard, (Paris, Editions de la MSH, 1990).
- 2 Marie Jahoda, Paul F. Lazarsfeld, and Hans Zeisel, *Marienthal: the sociography of an unemployed community*, (USA, Transaction publication, 1932, 2002).
- 3 Viviana A. Zelizer, *The social meanings of money* (New-York, Basic books, 1994).
- 4 James Agee and Walker Evans, *Let us praise now famous men: three tenant families* (Boston, H. Mifflin, 1939, 1988).
- 5 Elias, Norbert, Scotson, John L., *The established and the outsiders: a sociological inquiry into community problems* (London, Sage, 1994).
- 6 Roberts, Robert, *The classic slum: Salford life in the first quarter of the century* (London, Penguin books, 1971, 1990).
- 7 Calaferte, Louis, *Requiem des innocents* (Paris, Julliard, 1956).
- 8 Michael Burawoy, traduction française, “pour la sociologie publique”, *Socio-logos. Revue de l'association française de sociologie*, 2006, consultable en ligne: <http://socio-logos.revues.org/11>
- 9 Hans Georg Gadamer, traduction française, *Vérité et méthode, les grandes lignes d'une herméneutique philosophique* (Paris, Le Seuil, 1976, 1996).
- 10 Please have a look on the website “Workshop in narrative sociology” we created with my colleagues Jean-François Laé and Annick Madec: <http://sociologienarrative.com>
- 11 Maurice Halbwachs, *Les cadres sociaux de la mémoire* (Paris, Albin Michel, 1925, 1994).
- 12 Maurice Halbwachs, *La mémoire collective* (Paris, Albin Michel, 1950, 1997).
- 13 James Agee and Walker Evans, *Let us praise now famous men : three tenant families* (Boston, H. Mifflin, 1939, 1988).
- 14 Please accept the idea that the two snapshots are only samples. There are many snapshots in James Agee and Walker Evans' book, and I also have a large sample of snapshots from my 1980' and 2010' fieldwork.



- 15 Richard Brown, *A poetic of sociology: toward a logic discovery for the human scienc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 16 Richard Brown, "Narrative in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civic discourse", *Current perspectives in social theory*, 11(1990), Stanford.
- 17 Clifford Geertz, "Blurred genre, the reconfiguration of social thought", *American scholar*, 49(1980).
- 18 Gregory Reck, "Narrative anthropology", *Anthropology and humanism*, 8, N°1(1983).
- 19 Nancy Schmidt, "Anthropology's hidden literary style", *Anthropology and humanism*, 9, N°4(1984).
- 20 Eugenia Tsao, "Walking the walk: on the epistemological merits of literary ethnography", *Anthropology and humanism*, 36, N°2(2011).
- 21 Laura Bohannan, *Return to laughter: an anthropological novel* (Doubleday, 1954).
- 22 Lila Abu-Lughod, "Writing against culture", in H.L. Moore and T. Sanders (eds), *Anthropology in theory: issues in epistemology* (Blackwell, 2006).
- 23 Jane Addams, "Charity and social justice", *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 vol. 192 (1910), N°656, July.

